

第十三卷

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

目 录

思想复员论	5
中国青年运动的周期	12
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	18
中国需要重建权威	23
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	33
中国文化与民主政治	41
论学术道德	45
论近十年的教育政策	53
论重点教育与留学政策	57
现代国家的道德基础	62
论存储反应	68
附录 关于‘军与民的社会地位’	75
编后附记	79

思想复员论

抗战八年，中国除了沦陷全世界被侵略国中面积最大的土地，死伤最多的军民，损失最巨的物资以外，另外还有一种精神的损害，却不大为一般人所注意，然而其影响之大，后果之严重，足以妨害下一代的建国工作，乃至对于世界和平的贡献。物质和生命的损失是看得见算得出的，正如一个人割了一只手，炸了一条腿，创痛巨深，人所共知；精神的损害则像神经失常，貌似健康，实同瘫痪，一切工作，都受损害。现在复员工作之如此麻痹，内战危机之如此迫切，虽即谓之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战中所受精神损害之自然结果，亦不为过。而展望中国前途，照理讲应该无限光明，事实上则满目忧患。在日本投降之前我们若作此言，必且被目为杞忧，但在今日，则即使最乐观的人，也不敢认为这是耸听的危言了。

战后第一件事是复员，该复员者，从交通、金融、教育、军事说起，头绪纷繁，手忙脚乱；但很少有人谈到思想复员。莫非抗战八年，中国人的思想原封未动，或者今后建国，依然须要战时思想（好不好对不对是另一问题），无需改变么？

说到思想复员，当然包括大后方和收复区。收复区又包括台湾、东北，受敌伪奴役自五十年至六七年不等，在复员以前还要消毒，问题颇多，可以另成专论。然其最后复员，仍当以抗战根据地的大后方为蓝本，为标准。所以本文所论，仍以大后方的思想复员为限。

复员不是复原，应该更进一步，更加积极。中国战前的一切措

施，在准备抵抗侵略，今后建国，范畴不同。目标既异，性质亦殊。若只恢复到战前状态，不仅不够，亦且不可。然在复员过程之中，也许还须经过战前这一个阶段。所以也不能不附带说到战前的情形。复员的目标，不能不顾及今后世界的大势。一切工业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的建设无不如此，而战后世界思想的潮流，则为上列各项建设的指针，尤不可不注意。所以思想复员，是当前中国问题的核心。

二

在这次大战以前，全世界的思想分为二大壁垒：民主与独裁。民主国家崇自由，独裁国家主统制，崇自由故尊重舆论，主统制要统一思想。尊重舆论，故显得意见纷歧；统一思想，故容易事权集中。意见纷歧，则牵制亦多；事权集中，则功效易见。于是急功近利的短视病者，不免大惊小怪，认为民主主义没落了，代议制度失败了，要富国强兵，非独裁不可，非统一思想不可，非管制舆论不可，非这样那样，不足以御侮图强，……若论其动机，也许未尝不由于爱国心切。但这种思想，有一个危险的倾向，也可说是必然的结论，即如果让它发展下去，必然要役奴别人，同时也限制了自己的知识，终于毁灭了自己，与其所预期的得到相反的效果。因为自由是人类的崇高理想，不但现代人要自由，连原始人也何尝不要自由？不但人，连动物也有，哪一只鸟愿意被关在笼里，哪一条鱼愿意被蓄在缸里？违反了现代人类最基本的要求，不管理论如何漂亮，事功如何见效，最后终必害人害己，自招灭亡。试想希特勒，慕索里尼和日本军阀，如果不统制思想，容许人民自由批评其政策，牵制其行动，这次战争也许根本打不起来，又何至于使三个一等强国土崩瓦解，使全世界人类遭这样大的灾难？这些道理说穿了平凡得近乎幼稚，而在当时则多少名流学者，甘于身受奴役，而且为之宣传效力，希望别人又受他们的奴役，而结果如此，岂非人类的大悲剧？自由思想又是文化进步的必要条件，尤其是现代科学的原动力。侵略国家因为要迅赴事功，把自由思想者赶出国境，提倡实用科学，不注重理论科学，以为只要飞机大炮，便可

以统制全球。但是因这次战争而发明的原子弹，却是从原子能研究出来的。原子能理论起于相对论，而相对论发明者爱因斯坦却在战前老早被希特勒赶到美国去了。以德国的科学基础，如果发明了原子弹，可以兵不血刃而雄视全球。这又是统制思想者的另一教训。

中国自五四以后，思想自由本来已经打了一个基础。国民党的改组，国民革命的成功，乃至抗战之所以能造成舆论、推动政府，未尝不是受五四以后思想自由、民智进步之赐，这是谁都得承认的。孙中山先生论到心理建设，也曾指出新文化运动的贡献。而新文化运动中最大特色是英美传统的自由思想，一切哲学、文艺、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的主义理论，都被介绍到中国来，使顽固守旧者自惭寡陋，清末维新者自惭落伍。当时受教育的青年，都已成为这次支持抗战的主要干部。定都南京以后，北平因为不受政治影响，自由研究的风气得以充分发展，使中国学术界逐渐取得国际地位。而全国学生请愿抗战的风气，也起自北平，因此而有“一二八”之役，奠定抗战的军事心理，测定抗战的军力比例。继而有二十四年的“一二九”学生运动，使华北五省、平津二市的伪自治运动减至冀东二十二县。但我们也不能不沉痛指出，北伐以后因为内乱相寻，政府对于思想言论的统制逐渐加强。一方面则复古思想又抬头而得势。一个学者以新史学的眼光做了一部历史教科书，竟被禁止发行。民初北京政府的教育部有胆量制定并公布的注音符号，过了近二十年，已经铸成铜模，反而被禁止应用了。若干省份的长官，自己连一封信都写不通，也要提倡读经，谈古圣先贤的微言大义了。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之无补于富国强兵，早已经用甲午海军来证明，用一个帝国的崩溃来证明，然而许多心存魏阙的名流学者，也居然谈起“本位文化”来了。甚至于许多欧美留学生也不惜借此为终南捷径。这一切，本来可以引起思想界很大的波澜。但因当时国难严重，大家无暇及此。“七七”以后，军事高于一切，急于一切，因军事外交而统制消息和言论，政府有理由，人民也承认。至于思想，则只要不违背抗战国策，是不能也不必统制的，而复古之类，则根本阻碍进步，不仅与抗战无关，而且大有妨害。可是有的人却利用抗战的大帽子来压迫思想，箝制思想，束缚思想，

窒息思想，却大有害于下一代青年的精神健康。现在抗战既已完成，这顶大帽子自不能再被假借。思想的复员，是建设新中国的主要条件，一切复员的总关键。

三

如果说统制思想完全为了抗战的必要，那是没有的事。英美也抗战，何尝有此必要与现象？恰恰相反，争取思想自由是英美这次对德意作战的主要目标和号召力。如果说统制思想与抗战毫无关系，则也不尽然。在抗战初期，确有人迷信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办法，可以谋急功近利，认为统制思想也是必要的。但到后来，却完全变为争取派系利益的一种手段，并且不惜以威吓利诱种种方法来补统制之不足。这都比较因迷信轴心国全盛时代的行政效率而东施效颦，其存心更不堪问了。有的人要统制思想，却由于无知，例如我们常在有些建筑墙壁上看到一条标语道：“纷歧错杂的思想必须纠正”。只要略为想一想这条标语的文理和内容两俱不通，便可以原谅制造这标语者的幼稚了。所有这些，对于这一代的青年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不良影响。

统制新闻言论的对象是出版界，统制思想的对象是教育界——教育比较难统制，于是乎学生就倒了霉。统制必须有个机构，于是乎成立了训导处，成立了导师制。当然，这些制度，表面上是说仿照英国牛津剑桥的 Tutor System 说起来真漂亮，可是天晓得，牛津剑桥的 Tutor 会做中国学校中训导长的工作！可是一针见血的是训导长的资格限制：必须他本身是进过训练团受过训的。换句话说，必须他自己的思想先已被统制得四平八稳，决不纷歧错杂。战时学生来自陷区，受生活压迫最烈，政府设贷金及公费制度，本来是善意，是善举，但是审查贷金公费要看思想如何，还有其他种种见不得人面的条件（随各校情形而不同）清寒学生即使不愿意，亦必违心承认，其苦痛甚于“嗟来”之食。否则不但读书成问题，连生活都成问题。又以公费诱迫学生舍其所好而改习实用科学，还以为是在奖掖人才，试问

人间精神迫害之残酷，更有甚于此者乎？试问妨害国家文化发展之前途，更有甚于此者乎？有人以为：这种办法，意在使青年心智集中于机械工作，免得谈文艺，谈思想，谈社会科学——总而言之，免得谈政治，搞政治，必不得已而欲谈文艺，谈思想，则也替你预备好了一套，即所谓本位文化者是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，还不够吗？这是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论的复活。这个解释对不对是另一问题，姑且不说。但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，则嬴政所不烧的种树医药等书，相当于现在所谓实用科学，而他所痛恨的诸子百家，则大概是什么主义之类。

至于教授的思想虽不大好统制，而其所受的精神迫害也并不太少。平日因受生活压迫，设备限制，无法作研究工作，已是很大的痛苦；眼看着国家的危急，政治的不清明，而腾不出料理油盐柴米的时间来考虑国家问题，即使想到了，要说话，而其社会地位已为豪华的国难官商所掩蔽，不像战前那样有效力了，而对于国事又看得比较明白，有骨鲠而不能吐，这是何等痛苦！并且据我们所确实知道的，有的教授学问极有地位，却被指为有“思想”问题而解聘。而战时各校校长之更动频繁，又是另一种妨害学术文化的因素。最后，我们也没有忘记学校里的派系倾轧，党团侵入，对于教育界是怎样大的一种罪孽，对于思想界是怎样大的一种威胁。大学如此，中学更不必说。

当然，这种情形，在湘桂之役以后已见改革，以前也并非全国如此。大体说来，有历史的学校，在渝、蓉、昆的学校，比较能保持正常传统。至于在僻远省份学校，则其情形恐怕有甚于上文所述者。学生看鲁迅的书，可以被指为危险分子，而佩“自卫”手枪出入者，可以雄视全校，睥睨一切。至其思想之枯窘麻痹，则令人几难置信。许多学生作起文来，只能搬弄“党员守则”即“青年守则”的文字，因为其在中学时代所受“训练”说话越此范围即被目为思想欠“纯正”。

若要列举抗战以来教育界所有这类事情，真是更仆难数。我们指出这些事实，也知有的前已纠正，有的已因抗战结束而撤消（如新闻检查），并不是要算旧账，也不是什么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”之类，却是因为思想一经束缚，恢复非朝夕可致；而且今日二十岁左右的青

年，其受制在若干年前，当时尚未成年，当谈不到思想，而一经先人为主，以后恢复尤不容易，而今后三十年建国的重荷，却正落在这一代的肩上。这是一个何等严重的问题！

离开学校，来看社会，这几年的抗战，在一般人思想上烙印打得最深的，我觉得是一个“训”字。中国据说以儒教立国，但我不记得六经上究有多少“训”字，其意义是否和现在一样。而现在则受训、训练、教训、训示、训话（不错，还有精神训话。因为某校学生曾有警句曰：不怕飞机轰炸，只怕精神训话。所以令人特别记得）一碰就是“训”。在以前，“不足为训”四个字是连在一起的，而司马迁所谓“言不雅驯”之驯则是马字旁，与此无关。最近的联想，只有满清时代小城市里的地保有时奉命要讲“圣谕广训”，讲完了说一个故事散场，这个训字的传播，我想中央社最有功劳，因为并世任何国家长官讲演是讲演，而在中国则即使是校长科长，一旦讲演而记成新闻，必定变成训话。外国人的教练（Couch）、练习或锻炼（Train）、学习（Learn），一翻成中文，也就一律变为“训”、“练”、“受训”之类。甚至于外国职员见高级职员，明明他们自称为访（Call, Visit），也一定要译成“谒”。只有一个“奉谕”的谕字，还没有送给洋人。呜呼，侧媚之风，至今极矣！中国的精神文明已经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，谁谓人心不古，吾道其衰乎！然而据说所谓民主国家也者，官吏是人民的公仆。岂有公仆向主人报告其职务有关的事情，应该称为训话的？二千年前的“人之患”据孟子说是“在好为人师”，今日之患，将非在好训人乎！

四

在抗战期间，政府为军事、外交机密而统制新闻和言论，自有其必要；甚至统制思想，人民也都原谅容忍了。现在战事既经结束，自应开放言路，培养自由思想。中国如今已经挂上了国际民主列车，不论她能否或愿否民主；不但挂上，而且要时时刻刻提防脱节。否则便不能建国。这个道理既微妙，亦简单；可以说，但也无须说。现在谈思想复员，而思想在各人脑中，我要解放，谁也不能制止，不必也不能

请人代拆代行。复员不是复原，当然更不是复古。中国要建成一个自由国家，国乃人之积，非自由的人民，如何能变成自由国家？中国要建成现代国家，没有自由思想，如何能研究科学，发展文化，变成现代国家？中国要建成民主国家，人民自己如果不愿作主，懒得作主，甘居下贱，国家如何会变成民主？思想复员不必登记，也无黑市，思想必须迅速复员，因为中国已经挂上现代国际的自由民主列车，万一复员不够迅速，列车脱了节，弄得不好，出了轨，那才要倒五千年精神文明之大霉！

中国青年运动的周期



中国的青年运动，可说自有史以来，即迭相起伏。夏殷二代，民智初启 文献不足 比较详细的记载 起自《春秋》而《春秋》的作者孔子，仕进则握舆论的权威，退休则招集青年，做种种启发文化，批评政治的工作。这个“不知老之将至”的青年，虽无土地而有群众，其影响历数百年不衰，至汉高祖之再度统一，而邹鲁之士犹凛然不可侵犯，后人遂尊他为“素王”。“素王”者 用现代的话来说 是群众运动的领袖，在野党的党魁，他对于当时的政治人物，少所许可，连对管仲也毁誉参半，惟独对子产最为佩服，因为子产最尊重舆论，最爱老百姓。由于他的建立民主的政治批评，遂有战国末年的“处士横议”。当时好战的诸侯当然讨厌这些“横议”，但就整个的民族文化而论，这些横议无疑的是有贡献的。而那班“处士”——换句话说，尚未执政的学生，也毕竟因为有青年的求进步的热忱，所以才有“横议”。孟子是孔子的私淑弟子，所以他也比较有民主的思想。



以中国的整个历史看来，大概国势强盛，政治清明的时代，人民安富尊荣，自然不会发生什么运动。即使有，也只限于纯粹学术方面，与政治大抵无关。所以汉唐盛时，至多只能产生贾谊的痛哭太息，裴枢的高标清流，而鼓不起运动来。战国以后，历史上最大的青

年运动发生过两次：一次是东汉末年党锢事件，一次是北宋末年的太学生运动。前者的领袖李膺、郭泰等想把政府从宦官的腐化和专横中救出来，后者的领袖陈东等在外寇压境的危急时期力排和议，要求政府罢奸相蔡京而任在野的主战派李纲。由于桓帝灵帝的昏聩，郭泰等在政治上失败了，他的党徒杜密等进了宦官的集中营受非刑拷打，范滂等被切下脑壳，后来索性把成千的青年学生推入水中，说把这些自称“清流”的人物扔到浊流中去罢——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“自行失足落水”的妙语。但是腐化的宦官，也终于烂完了四百年的“汉业”。徽钦二宗比较有点知识，采纳了陈东的建议，虽然仍不免靖康之难，但却振起有宋开国以来的文弱之风，建立抗战的精神，支持了南宋的半壁河山。高宗因为自己想在杭州苟安一时，不听宗泽建都南京的建议，又把陈东杀了，但后来他良心发现，后悔不迭，又给陈东封墓赠官。故如以这班青年运动领袖的个人而论，或不免一死，但中华民族的气节和忠义的基础，却是他们奠定的。使后之执政者对于无权无勇的书生的言语，不能不有所顾忌而时时警惕，也是他们的功劳。

此外如东晋的羌胡南侵，按理说也该有青年运动。但因为东汉末年那次的大屠杀，把青年人杀怕了。在思想方面，佛教的消极主义和老庄的无政府思想又合流起来，使知识分子多倾向于逃避现实，而最大的原因，是因为政权操诸少数贵族阀阅，平民毫无发言机会。岂但平民，连知识分子都毫无办法，所谓“世胄躋高位，英俊沉下僚”。少数人把持政权，是走向亡国的特效药。所以南朝此起彼仆，政府如同传舍，北朝的中原旧族，竟至教其子弟受学鲜卑语、习弹琵琶的汉奸训练而不以为耻。东汉阻害青年运动的流毒，竟至于此！

明代因为已经有了陈东的大学生干政运动作基础，知识分子见到政治腐败，就比较的不甘袖手了。明末的东林复社，颇有东都余风：读书不忘救国。但是魏忠贤的集中营——东厂，比起东汉的监狱来还要残酷毒辣，国家亡了一半，马士英还要努力打内战，勾结奸阉余党阮大铖来捕杀青年学生，以图巩固其政权。当时稍有气节的知识分子，给前魏后阮杀逐监禁，弄得一干二净。结果，自然只好让崇

祯太息“君非亡国之君 臣皆亡国之臣”只好把“不爱江山爱美人”的福王送给敌寇，刺出血来做“福酒”喝！

三

本文所讨论的青年运动的周期，只限于近代。上文不过略举史实作为借镜，所谓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”。近代的青年运动，大都是由外患逼出来的。最早的戊戌政变，便是一个例子。在满清的积弱之下，光绪虽想励精图治，但是旧势力太深固了，几个书生敌不过昏后那拉氏的党羽爪牙，徒然牺牲了一批青年，禁锢了一个天子，招致了后来八国联军之入京。于是革命党人才知道改良主义之无补于大局，始有民国的肇建！所以辛亥革命，也可以说是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民族青年运动。而压迫青年运动者之终必覆亡，又得了个血淋淋的教训。

辛亥革命成功得太快了，出乎意料之外地早熟。那是由于袁世凯自私的诡计，所以他便靠从满清承袭来的尸居余气，把革命青年压迫到西南一隅，盗移国柄。他虽然终于倒了，但是承继他这系统的北洋军阀，无他的雄才而有他的腐化，使中国即使以欧战战胜国的地位而独不能取得国际的平等待遇，于是乎实际上在签定二十一条，接洽西原借款时就酝酿着的民众运动，便借欧战结束的时机爆发起来，这就是所谓“五四运动”。结果是中国的代表拒绝签字，山东问题悬而未决，遂有后来的华盛顿会议，九国公约。日本之怀恨美国，也怀胎于此。这个运动以外交的、政治的开端，扩展到文化的、思想的、文艺的，支流颇多而力量也随之分散。到了后来，几乎完全丧失了他的外交性与政治性，纯粹向学术文化方面发展，——这方面的贡献之大，史无前例，但是注意实际政治的人，渐渐的减少了对它的兴趣，而它也不再具有政治作用。遂使军阀政治的腐化，外交形势的恶劣，日益加深。于是埋头于政治工作的青年，发动了“五卅”运动。

“五卅”运动的文化意义不如“五四”，而其政治的、经济价值则远过之。此在参与“五四”运动的前辈，或许不承认。但事实是如此：

从事“五四”运动的人，只觉得中国自己太不争气，西洋文化之可钦慕，要努力摹仿，移殖，吸收；而对于当时西洋人文化的保有者所加于中国的剥削和压迫，则很少注意。这种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”的态度，这种虚心求进步的态度，固然极可佩服，却不免忽略了对外争取解放的努力。只有孙中山先生，常常提醒国人：中国是处于次殖民地的地位，指出了当时中国和列强之间的经济关系。他的青年信徒，鉴于文化工作之不能打倒受各帝国主义势力操纵着的军阀，于是到黄埔去武装起来了，大多数仍旧处在军阀压迫下的青年，便发动了“五卅”运动。这运动不仅唤起了民众更深刻的觉悟，并且第一次指出青年运动对于帝国主义经济压迫的影响，因此震撼了环伺中国，经常在吸中国人血的列强。其中最不放心而积极想灭亡中国的，便是日本。

四

这以后，可能的青年运动被准备着的国民革命吸收去了。“三一八”事件是一个黯然的结束。在外交方面，欧美各国已逐渐正视中国民族主义的勃起，承认中国民众的力量。

同时也因为第一次大战后各国竞争军备，经济恐慌和失业问题忙得喘不过气来，无暇东顾。日本便在民国二十年长江流域大水灾的秋季，偷袭东北。于是学生请愿抗战的巨浪，卷遍全国。平情而论，在当时的情势之下，要抵抗一个高度现代化的日本是很难想像的，但这运动却产生一种教育的力量，不仅使政府知道“国人可用”，鼓励她积极准备，并且孕育了十四年来反侵略的士气与民气。连当时居心投降的汪精卫，也不敢不说：一面交涉，一面“抵抗”。

塘沽协定以后，华北形势逐渐危殆。二十四年的冬季，日本捏造了“华北自治”的口实压迫地方政府脱离中央，激怒了平津的知识界，青年学生尤其愤慨，遂有“一二九”、“一二一六”的大示威。这次示威，北平报纸虽然被检查得成为没字碑，而东京朝日新闻上的“支那学生大陈列”，却成为头号标题。结果是华北五省，平津二市的“独立”计划没有成功，华北五省在日本的垂涎之下，青年的愤怒之下，又

保持了一年半。到“七七”事变，全国青年的力量，都被吸收在抗战建国的大事业中。

在这八年的抗战期中，军事高于一切，自然不会有什么青年运动，虽然三十一年春季昆明有过一次对内政的运动，但比起上述各次来，毕竟要不重要得多。日本投降以后，大家给胜利陶醉得莫名其妙，虽然有一大片领土脱离我们而独立，并且其独立并非由于当地人民直接要求，而由于和另一国家的谈判，却意外地平静。可是胜利的糖衣舐完以后，内战的苦果立刻痛楚了全国人民的心脏。看情形，正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完结时一样，中国又将以战胜国地位而堕入自相残杀的大混乱中，丧失已得的国际地位。并且第一次我们虽也参战，却并未受到战争的损害，这次是在历史上旷古绝今，在联合国中最久最大的牺牲者，如果不自爱，这一代的人将成千古的罪人。于是在三十年前的讨袁之役的根基地，一大群流浪青年发出全国人民下意识中长期期待已久的怒吼。不幸的是像反对内战这样天经地义的一句话，还要用孩子们的鲜血来写出，用知识分子的生命来传出，实在太可痛了。内战终于停止，死者可以瞑目，而内政外交种种问题，还是十分严重，于是上海和重庆的青年，一再发起运动，督促政府在內政和外交方面的努力。

五

我们综观近五十年来国势，一年危急一年，至“七七”事变而到生死关头。青年运动的周期，也一次迫近一次，假使我们把近五十年的中国青年运动列成一个时间表看，是很有趣味的：

- 一、戊戌政变（一八九八）——辛亥革命（一九一一）廿三年
- 二、辛亥革命——五四运动（一九一九）八年
- 三、五四运动——五卅运动（一九二五）六年
- 四、五卅运动——九一八事变（一九三一）六年
- 五、九一八事变——一二九运动（一九三五）四年
- 六、一二九运动——七七事变（一九三七）二年

七、抗战开始——一二·九运动（一九四五）八年

从这张表看来，青年运动的时间距离，逐渐短缩。表上第三第四两个阶段相同，这中间还夹着一个小小的“三一八”。只有第七一个阶段时距较长，因为对外战争期中究不该有什么运动，而其实中间（一九四二）还夹着一个昆明学生倒孔运动。所以大体说来，各阶段间时距的日趋短促，正与国势的危急成正比例。而且相当平均，成为加速度的上升。

本文只想对于中国近年的青年运动作一个客观的历史说明，并不愿加以任何恭维或夸大。不过远稽汉宋，近察国势，事实告诉我们，每当外患相煎，内政欠修的时代，青年运动必然起来，而执政者对之是否压迫，往往与其本身的是否腐化和知识水准为断，如果压迫而居然成功，则这个压迫最后亦必倒下去。这些事实，如影随形，如响斯应，历历可数，毫发不爽。对于青年运动如能善为利导，则可以挽救危局，发扬文化。每当政治修明，国势隆盛之际，当然不会有青年运动，所以青年运动可以说是不幸而产生的，因为它的产生证明了外交或政治上的重大缺点，所以往往招执政者之忌。但到应该产生而不产生或被阻遏下去，则无宁是国家更大的不幸——因为不产生表示民气的销沉，国魂的麻木；被阻遏下去是对于新生机的摧残。古人说：“天听自我民听”。最正当的办法是要善于利导，使他发挥成革命的建国力量，并且针对其所以产生的原因而加以改革。决不可使它潢决，成为互相牵制，而抵消国力。